

退等润

——《拓展生命长宽高》读后感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 生涯规划教育 思政教育

○张韦华

解答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生涯规划教育、思政教育与生命教育关系如何理解？如何结合并推进相关建设？教育培养人，无论培养什么样的人，基础和核心都在生命。

心理教育，我想用一个“退”字。这里不仅是学生的心理建构，更是教师的心理建设。心理健康上，我想到了一首诗歌。诗的意思很简单，不难理解。“手把青秧插满田”；描写农夫插秧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往下插。“低头便见水中天”；低下头来看倒映在水田里的天空。“心地清静方为道”；当我们身心不再被外物的物欲染着的时候，才能与道相契。“退步原来是向前”：农夫插秧，是边插边后退的，正因为他能够退后，所以才能把稻秧全部插好，所以他插秧时的“退步”，正是工作的向前推进。

学生的成长也是这样，从生命的慢成长、退成长中，给心灵更多的空间。

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需要充分认识到“退”的重要性。现在的教育很卷，心理问题很多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人家的孩子怎么样”竞争，尤其是同年龄同资质的同事、同学之间，竞争必是难免的。向着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很多时候难免会忽略了旁人的感受，缺少人情味。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说，面对身边人，即便是竞争，也要适可而止。可能在某一时刻是对手，在更长更远的空间和时间更是合作伙伴。身在团队，我们离不开竞争，更需要伙伴的合作和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在竞争中的适时让步，矛盾时恰如其分地忍让包容，很有可能为日后的前进腾出必要的空间。那么，退一步，又何乐不为呢？

生涯规划教育，我想用一个“等”字。张雪峰老师强力推荐，我们在高考后留出一年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喜欢的职业，去大厂实习，这对今后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现实会有更好的认知。搜狐张朝阳，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他为什么这么拼命，是因为他懂得自己要什么太迟了。他说国外很多学生中学时候就知道一辈子要干什么，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长处，并为之付出。他觉得太迟了。其实生命教育和生涯规划，就是

数学的线和点的关系。越早找到这个触发生命长宽高的点，对一生越有帮助。同时这个点的浓淡、大小程度，对孩子有巨大的冲击力、影响力也是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关键。朱永新教授在《教育的减法》中也曾经讲到一个孩子在有爱的国外寄宿家庭中，花了一年找到人生的动力的故事。当然如果孩子起初找到的生涯规划与自己的生命意义有转移，也应该用生命教育的理念，给予更多的人性关怀。

身为教师，从事教育，面对孩子的时候，作为一个长辈，同样“退步”成了一门艺术。都说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这个慢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可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这些体制内的老师，又有几人做到了呢？事实证明，每个人的特点和长处是不一样的。

思政教育，我想用一个“润”字。思政教育不是口号，而是润物无声的感染。回归到生命教育也应该把思政不露痕迹地渗透到生命中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思政教育很多时候用演讲形式表达学生的情感，

其实很多形式下是口是心非，似懂非懂，甚至有些用喊的方式表达忠心式的誓言，而一些孩子通过简单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平实的语言，比如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就被说成不思进取，没有远大的理想。常言道：“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又何况是我们凡人呢？虽然，我并不质疑应试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单纯的应试体制在客观上不仅让孩子美好的童年失色，更

有不可否认的拔苗助长之嫌，特别是思政教育的空洞、无趣、乏味，真的乏善可陈。尤为重要，是每个孩子的天赋各有不同，有人擅长文科，有人偏好理工，有人擅长舞台表演，有人喜欢泼墨挥毫，又有人热衷于搞点研究发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思政教育也应理解不同天赋孩子的情况。但是现在用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事实上的确是单一了。而在这种体制下学习生活的孩子难免会迷失了自己，甚至产生攻击行为，因为他无处发泄。

身为教育者的我们，退一步、等一等、润一下，能不能在我们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回旋余地内停一停，保护我们的孩子，给他们多一些他们喜欢的新鲜空气，给他们一点空间，哪怕是一条夹缝，让他们能生长自己的个性，那也是真的善莫大焉。相信他日蓦然回首时，一定会有一番灯火阑珊的美景。



《拓展生命长宽高》朱永新
著 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版
ISBN: 9787100209977
45.00元

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关键词 乡土文学 进城务工 城市

○罗岗

当我读着刘儒的长篇新作《情融北京》时，马上想到贾平凹在《秦腔》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虽然《情融北京》和《秦腔》是很不一样的作品，但不无巧合的是，刘儒和贾平凹都是陕西人，贾平凹的家乡在陕南的商洛，而刘儒则出生在关中的凤翔。如果按照年纪来算，刘儒应该比贾平凹至少半辈。贾平凹是1971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刘儒则早在1963年就考取了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他们的辈分有差别，不过都是农村的幸运儿，离开了农村，进入到城市，就像贾平凹说的那样：“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是的，他们“做起城里人了”，可“本性依旧是农民”。这种处于城乡之间夹缝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大体离不开“乡土文学”的范畴。

根据鲁迅先生当年对于“乡土文学”的经典理解，这种文学形态的关键在于：“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是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扩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贾平凹的《秦腔》和刘儒的《情融北京》都处于“乡土文学”这一伟大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上：之所以“隐现着乡愁”，是因为他们成了“城里人”；而“很难有异域情调”，则由于骨子里面“还是农民”。就像鲁迅评价塞先艾的小说：“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向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同样的，陕西也许离我们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贾平凹和刘儒曾经共同体会过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



《情融北京》刘儒著作
家出版社 2024年6月版
ISBN: 9787521228649
68.00元

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乐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侍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埂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也应该一起经历了“三农问题”给乡亲们带来的阵痛，“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在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赫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驰，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动，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

假如说在《秦腔》中，贾平凹还看不太清楚这些“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的农民的命运如何，他只是朴素地认识到，“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那么20年过去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刘儒在《情融北京》中，不仅体会到了“农民离开土地”之后的老虎“生气”，而且正在展望他们“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的美好前景。在其笔下，孙玉爱、成跃山等三家六个人离开陕西农村，来到北京打工，虽然也不乏艰辛，甚至遭遇了不小的危机，但他们用农民特有的朴素、善良、隐忍和坚持，克服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城市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就像小说题目《情融北京》所彰显的，这群“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的农民，不只是进入了城市，而且融入了城市。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他们的进入和融入，也重新规划、改变甚至创造了城里人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刘儒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传人，其小说不单是“献给故乡”的“薄礼”，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理想见证。

书写中非友谊故事

关键词 中国援非 医务人员 传统文化

○李强

中国作家协会和浙江省委宣传部刚刚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来自金砖10国49位外国诗人和23位中国诗人共同参加了这一盛会。我想从活动中的两个小小的花絮谈起。

第一个花絮。接机那天，我在浙江宾馆大堂迎接各位外国嘉宾。大概是夜里11时许，南非的客人到了。那天杭州的气温是40度。但他们其中一人穿的是羽绒服，还有一人穿的是毛背心加厚外套。他们甚至连拉杆箱都没有，手里拎着两个硕大的包袱，外面裹着一层亮晶晶的塑料薄膜。在我的印象中，南非是黄金的国度，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我没有想到，他们就是这样——请允许我用一个词——贫穷。非洲的黑人朋友见到我就和见到亲人一样，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在微微颤抖。我也被他们激动的心情所感染。

第二个花絮。到北京后，我们去长城和故宫游览。正值暑假，长城上、故宫里，到处都是孩子。见到黑人叔叔，孩子们一波又一波地涌过来，大大方方地打招呼：“Welcome to China. We want to take a photo with you.”其中还有一波是从新疆远道而来的孩子。孩子们的笑容真诚、阳光和灿烂，非洲朋友的态度亲切、友好。我拿起手机给他们拍照，在镜头中我发现，白白净净的中国少年和黑得发亮的黑人叔叔，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的相似。一个导游好奇地摸着手中“国际青春诗会”的小旗子，问：“为什么你的旗子这么吸引人？下次我们也印个和你们一模一样的。”

是啊？为什么呢？我们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相隔遥远，素未谋面，但我们的心与心是互相连通的，孩子们的心和非洲诗人的心也是互相连通的。我不禁想到了坦赞铁路，想到了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公路、港口，想到了中非经贸往来，想到了中国在民生方面无私、真诚、不求回报的对非援助。中国真心实意希望非洲人民过上和我们一样幸福美满的生活。1963年4月，第一批援助阿尔及利亚的13名中国医疗队队员抵达阿西部城市赛伊达，拉开了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序幕。一个甲子以来，一批又一批中国白衣天使奔赴非洲，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谱写一个个大爱无疆的动人故事，彰显中国与广大发



《中国妈妈》曾维惠著
希望出版社 2024年5月版
36.00元
ISBN: 9787537990103

展中国家同甘苦、共命运的天下情怀。作为一名从事对外文学交流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同时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作家拿起笔书写中非友谊的故事，书写中非友好交往、合作共赢的故事。

曾维惠的新书《中国妈妈》，以两个非洲孪生兄妹程中、程华和一个中国孩子林思齐的视角，从小切口进入大主题，用朴实自然的语言，娓娓讲述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看上去波澜不惊，实则却是惊涛骇浪。

高楠的母亲“妈妈程”多次参加中国援非医疗队，其工作给当地很多家庭和孩子带去了福音，程中本名叫巴赛尔、程华本名叫依布蒂哈吉，他们就是在“妈妈程”的救治之下才活过来的。“妈妈程”后来牺牲在非洲那片遥远的土地上。小小年纪的林思齐与高楠不是同一代人，但他的妈妈也是参加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而被非洲“吞没”的。小说没有用可歌可泣的笔法直接书写这些悲壮的故事，而是用亲人的思念，颇为巧妙地设置悬念，吸引着读者去探究：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对一件件日常生活琐碎的描写中，带着读者缓缓地探寻看似平凡的事业之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曾维惠是一位高产的儿童文学作家，她擅长准确把握孩子的心理。一方面，是对书中人物心理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对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心理的把握。她更多地把世界的美好呈现给孩子们，把人间的真情、真爱呈现给孩子们。《中国妈妈》一书在书写中非友谊的同时，巧妙地把中华文化融入故事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发展的魅力。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步步升华中非友谊，就是援外医疗的意义。非洲人民不可能记住医疗队每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一定会记住中国医生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最美的名称，或许就是曾维惠新书的名字——中国妈妈。

这就是我在讲述两个花絮时提出的那个“为什么”的答案。参加国际青春诗会的非洲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位“中国妈妈”？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是不是也读过像《中国妈妈》这样书写中非友谊的文学书？“一带一路”合作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作家朋友静下心来挖掘这座中外友好交流的“富矿”，期待有更多书写各国人民友谊的文学作品面世。

唐音东传 开枝散叶

关键词 日本 汉学 传承

○张渭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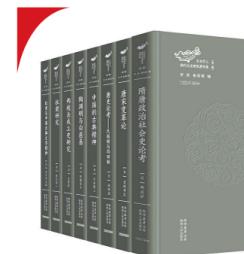
近年来“域外看中国”渐成显学，尤以“东亚汉文化圈”视角最为人称道。作为“丝路考古”与“唐代文史”研究重镇的西北大学勇领风气，现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李浩教授联合日本杜甫学会会长松原朗教授，于2019年7月主编并出版了能够体现当代日本唐代文史研究特色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第一辑“八人集”。目前该套丛书的第二辑、日本唐代文史研究现代大家名著的“八人集续编”，列入陕西人民出版社“海外研究中国书系”，于2024年7月出版发行。

通过这两辑“八人集”，可以感受到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化抱有一贯的“敬爱、传承、融汇、创新”精神。两辑从书所甄选的著者也能反映出日本汉学研究三大主流学派各自的传承关系。两集“八人集”所选的作者已然占据日本三大主流汉学学派人物的半壁江山。

我翻译了两辑丛书中的三部：第一辑松原朗《晚唐的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第二辑吉川幸次郎《杜甫与中国文学的精神》与松浦友久《陶渊明及白居易与中国文学研究》。由此三作也可看出日本从20世纪中期(吉川幸次郎)到20世纪后期(松浦友久)再到21世纪(松原朗)之间的传承与创新。

首先，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权威、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自幼热爱汉文且以“支那人”自居，敬慕孔子而字“善之”，一生坚持穿汉服、说汉语、写中文，并自诩“市井中的儒者”。《吉川幸次郎全集》自1968年至1996年，历经“自编版”“增补版”“决定版”“遗稿集”“讲演集”等扩充，现有31卷行世。

其次，日本汉诗及李白研究权威松浦友久(1935—2002)在继承发扬津田左右吉所创立的早稻田大学“东洋学统”，注重“文献考证”学风的同时，还受教于“京都学派”仓石武四郎创设于东京的汉学塾“仓石中国讲习会”，接受了晚清考据学的小学与音韵学学术熏陶，精研日本汉文学史、汉文音韵学文字学、唐诗与日中比较诗学。松浦从文献考据与史地实证相结合的角度，以黄河为线索研究唐代诗歌，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风靡日本列岛的“唐诗之旅热”。正如吉川幸次郎后来转为日本儒学研究，松浦也更为注重发掘日本汉诗自身的同一性特质，从而



《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第二辑)李浩、松原朗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版

为日本汉诗源流及日中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基础。

最后，作为松浦友久弟子的松原朗主编，代表着21世纪日本唐研学界的一个新高度。承继导师《唐诗之旅·黄河篇》，松原推出了《唐诗之旅·长江篇》(社会思想社1997)，也在日本广播电视台(NHK)主持“唐诗讲座”，并以专著《中国离别诗之成立》(研文出版2003)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称号。松原着力发掘杜甫对后世尤其是对中唐文学的深远影响，完成了日本中唐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晚唐的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专修大学出版局2012)，创造性地提出以张·姚·贾等为代表的晚唐武功体具有“崇尚俭朴与倦怠懒散”的审美特质。作为新世纪日本唐研学界的代表，松原朗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继承发扬日本汉学界“敬爱之传承、了解之同情”传统的同时，着力强调日本对中国古典的主动受容并发挥出有别于中国的日本独创性，激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魅力。

据日本学者佐藤浩一博士近年连续发表的《年度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统计，2013年~2020年，日本共出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专著55部、发表论文200篇、出版译注47部、出版译著5部、发表译作5篇等，尽显日本持续而强劲的唐代文学研究活力，而其中的中生代及新生代的研究者尤显“日本本位”的创新性趋势与特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与民族文化自信之间是具有逻辑和实践意义上的内在关联的。新世纪与新使命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继承自信，还需要借鉴发展。而中国文化要“自信”，首先就离不开以“东亚汉文化圈”为首的域外文化的“他信”，其次需要通过域外文化之间的“互信”，才能最终达成世界文化美美与共的“共信”。

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主编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第二辑)就尤能彰显其标榜风气、深中肯綮的学术价值与“山川异域，心理攸同”的人文关怀。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在了解日本汉学“敬爱、传承、融汇、创新”精神的基础上，进而如日本主编松原朗所言——不断去体认领悟“日本这种滋养其汉学所特有的‘放任’的人文与风土”，以研习借鉴日本汉学千余年来受容与创造的典范意义。